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韦宗友**

【内容提要】 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主张、主要内容和政策实践。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内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多个维度，其中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是重要前提，和平共处、平等协商是主要手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最主要内容，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则是其目标和方向。在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和实践，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nd especially its top leaders' vi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argues that China's vision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ains at least four dimensions: politics, economics, security, and culture, wherea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dignity is the precondition,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consultation on an equal footing is the main vehicle, anti-hegemony and anti-power politic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 harmonious world is its ultimate goal.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during the past six decades, China's vision of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本文写作得到苏长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11&ZD074)的资助。

** 韦宗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 21 世纪初最为突出的国际政治现象。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权力格局，也必将大大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的发言权和治理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中的一员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潮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发展脉络、主要内涵以及中国共产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实践三个方面，逐一加以阐释，以求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发展脉络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①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第 36 页。

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維護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①胡锦涛关于建立和谐世界以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和阐述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时代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与主张。

1.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

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谋求国家间关系的平等,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缔造者确立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行将结束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强调了独立、平等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在具体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新约的对外关系主张。他提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①随着内政的全面爆发和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敢于同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力量进行斗争,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魄力。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指出,“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上述对外关系思想进一步提炼和归纳,写进了新中国第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该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它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指明了方向。

进入50年代,中国先后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及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扩展,同时也为了将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对外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动辄以武力威胁相区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负责主持起草条约的周恩来就在条约的第五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3、4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1、62页。

中提出：“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不难看出，这一条款已经具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雏形。1953年，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时，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提出，两国关系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1954年4月，中印双方就西藏问题签署了协定，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同年的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再次确定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表示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与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特别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在会见中还指出，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不能对小国搞歧视。“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①“对于友好国家，我们的态度像兄弟一样。对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只要它们一天继续如此，我们就一天也不屈服。像我们这一类国家受过很多气，亚洲、非洲国家都是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气的。”“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假如亚非各国都能如此，到那时候就不会由几个大国称霸了。”

随着众多亚非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相继出现了“离心”现象，毛泽东适时提出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主张，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中间地带”和“第三、第二”世界联手共同反对“第一世界”，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在1954年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他指出，美国将反共“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8—194页。

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①换言之，毛泽东将美苏（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视为中间地带，美国的目标是以反共为名，行奴役、控制之实。后来在1955年、1958年、1962年的几次谈话中他又再次提到了“中间地带”的概念。到1963、1964年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资本主义阵营内法国等国自主意识的增强，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的主张，并将中国也划入“中间地带”。他说：“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②

在提出“中间地带”思想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他在1964年1月与斯特朗等外国记者谈话时第一次提到“第三世界”的概念。他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③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谈到的“第三世界”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第三世界不太一样，它不仅包括亚非拉等经济不发达国家，也包括受到美国压迫的其他发达国家。它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与他此前反复提到的“中间地带”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同年1月，毛泽东在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再次提到“第三世界”概念。他说，中法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辱。“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相互往来。虽然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508-509页。

③ 同上书，第514页。

国、苏联自诩为大国,将法国、中国视为小国,但是“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看似强大,但实际上都是“纸老虎”;要建立“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①到70年代,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他以前提出的“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概念作出了部分调整,较为完整地提出和划分了“三个世界”概念。1974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是第三世界。^②

无论是“中间地带”、“第三世界”概念的提出,还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的着眼点都在于反对霸权,反对干涉,谋求国家间的平等、独立,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霸斗争,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毛泽东在1956年会见老挝首相富马亲王时曾强调,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捍卫独立与和平。“我们许多亚非国家过去都受到外国的统治,现在获得独立后,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和独立。”^③1964年,毛泽东针对巴拿马人民的反美斗争发表讲话,强调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他还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要联合起来,所以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④毛泽东在会见拉美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时解释道,中国要和平,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中国坚定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战争和反帝斗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⑤在会见法国官方和民间人士时,毛泽东多次表达了对法国奉行独立政策的赞同以及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20—522页。

② 同上书,第600—601页。

③ 同上书,第243页。

④ 同上书,第510—511页。

⑤ 同上书,第530—531页。

际间的事应该由各国协商的思想。他说：“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①“这个世界不大安宁。……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这是行不通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②

2. 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

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更多的是关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民族尊严，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建立与发展平等的外交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那么，邓小平、江泽民等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较为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与原则。

邓小平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在不同场合下、反反复复提到的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句话（有时他也将第一和第二句合并一起）之中：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第二，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就提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即便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③1980年，邓小平在对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论党际、国际关系时也反复强调，反对对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他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

② 同上书，第589—590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绝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①

1982年8月,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句话,或者说三个基本的原则。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他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因为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是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针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做“第三世界的头头”,邓小平强调:“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反映出邓小平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家长作派的反感。^②1984、1985年间,邓小平在会见巴西、马尔代夫、缅甸等国领导人及日本访华代表团时,再次强调了上述思想。他说,“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他还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冷战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8—319页。

② 同上书,第415—416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57、94、96、104页。

行将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试图主宰国际关系的企图，邓小平适时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认为这将是“中国外交在新形势下‘有所作为’”的主攻方向。1988年12月，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邓小平谈到，世界总的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他说：“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通过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作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次年10月，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邓小平还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①此后邓小平更是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将此前一直提到的“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政策主张具体化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领导人时再次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②针对冷战行将结束、国际局势变化莫测的新局面，邓小平一方面顶住一些第三世界希望中国当头的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② 同上书，第353、359、360页。

要求,坚持韬光养晦,但同时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努力的方向,就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思想,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全面深入阐释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以及新安全观等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论及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时,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他指出,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它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②

此后,江泽民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深入阐释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政策主张。它具体包括:第一,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遵守这些原则,是和平共处的应有之义和必要前提。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国家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之间的争端,地区之内的冲突,应该通过和平谈判、平等协商逐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而不应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强权行为。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各国自己去办,世界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来解决。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的差异,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任何国家都不得利用自己经济、技术和金融方面的优势,去损害别国的经济安全和发展。^①

1999年3月,江泽民在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上首次阐释了中国关于构建世界和平的新安全观。他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什么是新安全观呢?江泽民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它具体包括: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41—545页;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② 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

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阐释了新安全观,并正式提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问题。他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要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持续努力:各国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只有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严格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世界各国才能真正和睦相处;营造共同安全。应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一切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都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江泽民指出,维护世界和平,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促进共同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但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中等的一员,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来掌握”。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当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他还特别提出,联合国应该成为各会员国共同协商、民主处理国际事务的场所,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①

2002年4月,江泽民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说,再一次全面阐释了中国关于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说,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

^①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7—111页。

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历史反复证明,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尊重世界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树立以互相、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特别是要缩小南北差距,防止一些国家被边缘化。^①

3. 胡锦涛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适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进一步推向深入。

2005年4月,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亚非峰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他指出,在新形势下,亚非国家都面临着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为此,亚非国家需要相互支持、协作,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亚非国家要成为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经济上要成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在安全上要成为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合作伙伴,树立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共同应对各种威胁,维护世界和平。^②同年7月,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双方表示,“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与发展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同年9月,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

^①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2—4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48—851页。

60周年首脑峰会,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讲话,第一次全面阐释了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他说,联合国成立六十年来,尽管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的新历史条件下,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携手共进,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积极努力: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要发挥联合国在保障全球安全中的核心作用。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①

此后胡锦涛在各种不同的国内、国际场合中,向世界倡导推动建立共同发展、和谐共赢的和谐世界主张。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93—997页。

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①在2009年9月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讲话,再次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创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深入人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携手并进,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懈努力。为此,胡锦涛提出,国际社会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共同推动。第一,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争端,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发展息息相关。没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和平等参与,就没有世界共同繁荣,就无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第四,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我们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加强对话,消除隔阂。倡导开放包容精神,使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② 胡锦涛:《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人民日报》2009年9月25日。

此外,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及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端后,胡锦涛积极利用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机制、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金砖国家峰会机制,提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张与要求,它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主要内涵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六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相对模糊到逐渐清晰,从比较抽象到具体深入,从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国际主义到较为冷峻的现实主义,从集中关注政治到全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诸多领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执著追求、冷静思考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主要涵盖如下内容: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是前提,和平共处、平等协商是手段和具体体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最主要的内容,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是目标与方向。

1. 维护主权独立、捍卫民族尊严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提

从最朴素的意义上说,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各国自己去办,世界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来解决”。但是,如果一国主权受到侵害或者不能独立,那么一切都将落空,主权独立是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有了主权独立,就谈不上民族尊严,也就谈不上平等协商,更谈不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要就是针对这种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侵害他国主权独立的政策和行为。

对于缔造共和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来说,维护主权独立、捍卫民族尊严有着特别的意义。近代中国百余年遭受列强的侵略、侮辱,被迫签订的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像一把把利剑插在每个中国人的胸膛上。国土被瓜分,经济被盘剥,人格被侮辱,权利被剥

夺，中国人在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上沦为任人宰割、任人侮辱的“劣等民族”。维护主权独立、捍卫民族尊严首先意味着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站起来”，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绝不允许外国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中国与谁建立外交关系，选择何种社会制度，是中国的自主选择 and 决定，他国无权干涉。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的“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敌人”，都是这种独立自主外交的生动体现。这一时期，中国对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以及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也是这种独立自主外交的体现。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来说，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是建立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前提，也是国际关系平等和民主化的前提。

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不仅仅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建立对外关系的基础，也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届领导人发展对外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后，总体而言，我国的外部环境大幅度改善，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常以人权为由对我国内政外交进行干涉，指手画脚，特别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这种倾向日益明显。自邓小平以来的几届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秉持的一个基本态度是，一方面中国支持和尊重人权，也承认中国的人权与所有国家的人权一样存在着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认为，人权基本上是一国的内部事务，各国可以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促进人权的发展，但绝不可以人权为由进行无端指责，甚至侵害一国的主权和尊严。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际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①胡锦涛在2004年8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1—332页。

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①他在十八大报告中重申,“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②

2. 和平共处、平等协商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维护主权独立和捍卫民族尊严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提,那么,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国际事务的平等协商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手段。如果国际关系依然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一切都是大国说了算,小国根本没有发言权,那么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就无从谈起。只有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才能真正体现和践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在国家间关系中的贯彻执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贡献。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一直由西方列强主宰,它们虽然提出了主权观念,但主权主要是大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特权,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大多沦为西方列强瓜分、宰割和盘剥的对象,它们的主权得不到承认、保护和尊重,国际关系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联合国成立后,虽然在法理上第一次赋予了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地位,但在实践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中小国家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它们的主权和内部事务时常受到大国、强国的干预。新中国成立后,在它与社会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也是它与国外签署的第一个条约中,就明确地将“平等、互利、相互尊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在随后与印度、缅甸等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签署相关边界条约时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原则并将其概括发展为新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几十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但这一由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印度）首先提出并倡导的国际关系原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平等协商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如果说和平共处更多地强调一国内部事务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他国无权干涉，那么，平等协商主要关注的是地区和全球性的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它比不干涉更进一步，体现了新中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主张和诉求以及对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排斥和拒绝。平等协商是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个基本立场。例如，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下，曾反复提到国际事务要大家平等协商，不能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①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在谈到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时也反复强调：“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任何一个国家和一种力量，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来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②

3.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对立面。霸权主义、强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89—5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52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奉行强权即公理，损害中小国家和弱国的权利和尊严，它是国际关系不平等、不民主的重要根源。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受害者。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它们对中国自主选择的制度和内外政策横加指责和干预，甚至阻挠中国的统一和国际承认。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旗帜鲜明地奉行反美、反霸政策，并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霸斗争。中国在国内建设百废待举，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还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和抗美战争，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斗争和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中国奉行反霸政策的具体体现。在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敌人”，也生动体现了中国对无论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还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70年代开启中美关系，“联美抗苏”，也是出于对苏联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战略反制。例如，毛泽东在1973年、1974年会见美国的基辛格及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方时就曾指出，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①

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时也指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将“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而邓小平本人的外交思想中，反对霸权主义也是核心内容之一。他在不同场合中谈到的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三句话或三个主要原则中，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放在首位。江泽民、胡锦涛在谈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秩序时，也反复谈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江泽民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永远不谋求霸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坚

^① 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载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①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也提出:“我们要积极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③

4. 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与方向

国际关系能否最终实现民主化,最主要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能否建立一种超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型国际关系和秩序,能否建立一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换言之,国际关系民主化能否实现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最终建立一种新型国际秩序和一个真正和谐共处的新世界。

尽管毛泽东等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未能明确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但他们旗帜鲜明的反霸主义和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外交思想,以及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际事务平等协商思想,为建立新型的国际秩序预备了必要的前提,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些前提和基础上,邓小平、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以及具体内容,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与主张。邓小平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时,反复强调这一新秩序的前提条件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国际新秩序包括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前者主要是要解决南北问题,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后者则主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不干涉他国的社会制度。^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52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83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④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2—283、328、353、359—360页。

江泽民在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内容进行了细化,使之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诸多方面。特别是他提出的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性,新安全观等,直接构成胡锦涛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内容,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和逻辑体系。

三、中国共产党推动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主要实践

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思想层面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1. 在国家间关系中积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提倡平等协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中缅边界谈判中首次提出并应用后,成为中国指导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迅速获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和赞赏。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期间首先表示,这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巩固和发展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之间的友好关系。1955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表示,柬埔寨决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政策的指针。老挝首相克特表示,“老挝政府完全支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尼泊尔政府指出,“五项原则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正当办法”。^①1955年首届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在中国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通过了包含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十项原则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表示在彼此关系中“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利益和合作”等,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被吸收进重要的国际会议文件,成为指导亚非国家乃至所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1957年毛泽东主席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

^①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间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亚非14个国家，提出了我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我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提出与阿拉伯、非洲国家关系五原则时，周恩来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并且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正是从这些原则出发，中国在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时将奉行以下立场：(1)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这一立场也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时一贯坚持的立场。^①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提出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其中的第一、第二项集中体现了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互助的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延伸：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②

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诸多关于双边关系原则的正式文件中，如著名的《中美上海公报》和《中日联合声明》，都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至今，已有近百个国家在与中国签署的双边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此外，中国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例如，邓小平、江泽民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乃至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秩序，都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秩序的基础。

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87页。

② 同上书，第388页。

③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 1974 年第 6 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对此，温家宝在 2004 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50 周年大会上作了很好的总结，他说，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一，它提供了相同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正确指导原则。其二，它指明了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其三，它有力地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其四，它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①

2. 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霸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将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视为中国人民分内的责任。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庄严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霸斗争的支持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外交和道义上积极支持；第二，在经济上积极援助；第三，在军事上进行援助。有时，这三种形式同时进行，体现出中国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卫新生的朝鲜人民民主政权和反对美帝对朝鲜新政权的威胁，中国义无反顾地打响了援朝抗美战争，在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在新中国百废待举、统一尚未完成的艰难条件下，志愿军付出了极大的人员伤亡，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确保了中国大陆的侧翼安全，维护了亚洲的和平，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此后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中国不仅在政治和外交上积极支持，还在军事、经济上鼎力相助。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中国先后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援越部队参加

^① 温家宝：《弘扬五项原则，促进和平发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6 月 29 日。

^②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1 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第 447 页。

对敌作战，还给予越南力所能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仅是援越抗美战争期间，中国的援越物资总价值就高达 200 多亿美元，其中 93% 以上是无偿援助。^①可以说，没有新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倾囊相助，越南很难打赢抗法和抗美战争。

除了对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革命战争的军事、经济支持外，对于其他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霸斗争，中国也给予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据美国学者研究，1956 年至 1977 年间，中国先后向 36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 24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相对于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对外援助总额的 50% 和中国对五十多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的 70% 以上。^②1956 年，埃及为收复苏伊士运河而与英、法展开斗争时，中国给予了坚定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说：“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略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③毛泽东在接见埃及驻华大使时说：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的侵略行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并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中国将向埃及政府捐赠 2 000 万瑞士法郎，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也是中国首次向北非国家提供经济援助。^④此外，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民族解放斗争、刚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古巴人民的反美侵略斗争、巴拿马人民的反美干涉斗争，中国政府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不仅从外交和道义上进行声援，还在经济上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60 年代，毛泽东还频繁接见亚非拉各国和地区来访的朋友和代表团，积极支持他们的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他在不同的场合中表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

① 古小松编著：《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第 240 页。

② 于子桥：《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沈浦娜译，《北大非洲研究丛书——中国与非洲》2000 年 1 月，第 274 页。

③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1 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第 447 页。

④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第 539—540 页。

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①

3. 维护联合国权威，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联合国宪章》规定，各成员国主权平等，在国家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得侵害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但在联合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把持下，《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长期得不到贯彻，联合国一度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执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在美国的操纵和反对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时期被剥夺。随着美苏在世界范围争夺霸权的加剧，联合国又沦为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阵地”，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其功能几近瘫痪。直到60年代以后，随着一大批亚非国家的独立和相继进入联合国，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将联合国转变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舞台，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状况才逐渐被扭转。正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支持下，中国于70年代初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也逐渐改变此前对联合国的不承认和批评态度。从1972年，中国陆续参加了联合国下属的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贸发会议、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重要机构，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这也是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先声。不过，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主要以政治事务的参与为主，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涉及不多，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裁军持否定态度，更多时候是将联合国看作反映第三世界呼声、反对大国霸权的论坛。一位联合国代表曾如此形容中国在联合国的行为：“他们来了，他们笑了，他们走了。”^②

中国对联合国全方位参与始于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中央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调整了对外战略，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和

^①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15日，转引自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第177页。

^② Micha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 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998, 转引自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与联合国外交1949—2009》，载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全方位的和平共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调整使得中国进一步认识到联合国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事务,联合国成为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在政治上,中国进一步重视联合国的作用,认为联合国对世界的影响不可替代,全面参与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的工作和活动。在安全上,改变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敌视态度,从1982年起开始缴纳联合国维和费用,1988年加入联合国维和特别行动委员会,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裁军谈判,并在国内主动进行了多次单方面的大规模裁军。在人权问题上,自1981年起一直担任人权委员会成员,并先后加入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七个国际人权公约。在经济领域,中国陆续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成为理事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①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冷战结束和美国权力的急剧膨胀,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来自美国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美国希望主导联合国,力图将联合国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为其建立单极霸权服务;另一方面,一旦联合国未能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美国时刻准备抛开联合国,实行单边主义。对于美国对联合国的机会主义态度和单边主义行动,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反对美国的多边主义和机会主义,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中国积极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反对在对外事务中动辄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借口人权和人道进行军事干预,主张通过联合国对相关争端和冲突进行斡旋,主张以政治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仅积极缴纳维和费用,还派出大量维和人员赴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维和行动,成为目前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

除了维护联合国权威,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外,中国还努力发展与大国、周边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对话关系,参与各类地区及全球性国际组织和机制,成为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据《国际组织年鉴》记录,2000年中国总共参加的国

^① 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与联合国外交1949-2009》,载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3-35页。

际组织为 3 090 个,其中 1 415 个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到 2007 年,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上升到 4 386 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为 1 753 个。^①中国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政府组织,利用这些平台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4. 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制度建设

90 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注重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制度建设。毕竟,如果没有坚强的制度保障,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中国着重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改革既有制度,二是创建新的制度,三是退出某些不合理的制度。

冷战结束后,改革联合国的呼声十分高涨。从 1992 年开始,联合国正式酝酿安理会改革,1993 年根据联大有关决议成立了改革小组,广泛听取各国意见和建议,自那时起,几乎每年联大都要就此展开激烈辩论。^②中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了改革联合国问题。1986 年第 41 届联大上,中国外长吴学谦指出:“联合国机构应当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目的应当有利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而不是使之削弱;应当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而不应当违反。”这是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最早公开发言之一。此后,这一立场作为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原则精神延续了下来。^③2005 年,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指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

①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uide to Global Civil Networks 2001—2002*, Munchen: K. G. Saur, 2002;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uide to Global Civil Networks 2008—2009*, Munchen: K. G. Saur, 2002, 转引自蒲博:《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组织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② 钱文荣:《论联合国改革与联合国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③ 傅干:《中国、美国与联合国改革:一项比较研究》,《理论界》2012 年第 5 期,第 203 页。

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文件同时提出了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改革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等;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应发扬民主,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一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不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作出决定。^①换言之,中国既积极支持对联合国的改革,使之更加符合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但改革的目的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高其效率。

除了推动联合国改革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早在2005年中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就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议题,获得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胡锦涛先后在同年7月和11月分别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和首届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上,阐释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具体主张: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

^① 《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2005年6月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6/08/content_3058885.htm。

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①在此后参加的多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中国政府进一步阐释了上述主张,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

在创建新制度方面,最为突出的两个案例是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共同创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2009年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共同创建的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秉持互信、裁军及合作安全的新型安全观,创立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培育不同制度、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②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是推动不同文明、文化共处、合作、协商的成功典范,成立十余年来,不仅成员国适度扩大,地区影响不断增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和平与安全,有效打击了“三股势力”,加强了成员国及地区的政治互信、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

2009年中国、俄国、印度、巴西四国在俄罗斯召开了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宣告金砖四国协商机制的成立。这是中、俄、印、巴新兴大国举行的首次首脑峰会,标志着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崛起。此后,金砖四国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首脑峰会,并同时举行各个领域的部长级会谈,加强彼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2011年,南非应邀加入,金砖四国变成具有五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机制。金砖国家在峰会中,积极提出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的主张和诉求,力图以集体的声音发出新兴大国的政治、经济诉求,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适时退出不合理的旧制度,也是中国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在国际组织中的政治地位,左右国际议程,操纵、控制国际舆论,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利益长期被压抑。七国/八国集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排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8—512、732—733页。

^② 江泽民:《深化团结合作、共创美好世纪: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

性的富国俱乐部。它虽然成员不多,但自1975年正式成立以来,在国际政治乃至经济议程中的影响力巨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联合国的相关决策和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力,八国集团开始启动与新兴大国的“对话机制”和“海利根达姆进程”,但这种对话是不平等的,是西方国家“发出邀请”,发展中大国被动接受的不平等对话形式,而且在对话议题的设定方面,也基本上是西方大国单方面设定议题的“单向道”。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形式早在2007年德国启动“海利根达姆进程”时,就已经遭到中国、印度、南非等大国的不满,到2009年,随着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的崛起,这一对话进程中断,中国等国也一劳永逸地退出了这一不平等对话机制。新兴大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磋商转而在二十国集团这一新兴的平等平台上进行。^①

结 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曾经饱受列强欺辱的前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地站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霸斗争,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等协商机制,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为此,新中国在面临巩固政权和国内建设的繁重任务下,依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给予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霸斗争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对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美、反法战争中倾囊相助,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牺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间关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合理化改革,积极推进多边外交,反

^① 韦宗友:《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108—112页。

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进入 21 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中国提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提倡经济上共同发展、和谐共赢;文化上相互借鉴和交流,促进不同文明相互对话和谐共处;安全上平等互信、互利协作。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并通过改革旧制度、参与创建新制度和适时退出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从制度上推进和保障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展望未来,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将日趋明显,新兴大国在国际权力格局和治理格局中的地位 and 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强,尽管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将不会逆转,相反会加速推进。